

敖包祭祀：从民间信仰到民间文化

王 伟 程恭让

提 要：本文通过对两个“旗敖包”祭祀仪式的田野研究，着重对祭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仪式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探讨敖包官祭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如何完成意义演变与价值重构，旨在说明仪式及其意义通过祭祀过程所构筑的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来表达。敖包官祭作为一种象征，通过民众的参与，完成了从神圣秩序到世俗秩序的转变，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了敖包祭祀的文化价值。

王伟，鄂温克族，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程恭让，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题词：敖包祭祀 民间信仰 象征 秩序

敖包祭祀是北方草原民族的重要习俗之一，蒙古族、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都有祭祀敖包的 tradition。通常认为，“敖包”是蒙古语，意为“石堆”。达斡尔族称作“斡包”，“斡包”在达斡尔语中的意思和蒙语类似，也是指石堆。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期草原民族的敖包祭祀非常兴盛。20 世纪中后期，祭祀敖包的习俗曾一度衰落，自 20 世纪后期以来，这一传统又开始复兴，如今，敖包文化成为我国北方草原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敖包的起源及功能

清代的文献中，记载了当时分布在草原的部分敖包。这些敖包大多作为游牧部落分疆的标志，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敖包最初就是作为疆界的标志而修建，后来才因各种原因而成为祭祀圣地。当前，学界对于敖包文化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记载，关于敖包的起源及演变等问题尚在争议之中。

（一）敖包起源的主要观点

目前对于敖包起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蒙古族敖包的分析上，学界主要观点有：一是认为敖包原为北方游牧少数民族区分疆界的标志，其依据为一些史书中的记载，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疆理》中提到的很多鄂博，都被确定为蒙古各札萨克的游牧边界。因此无论是学界还

是民间，都有人认为敖包是以前区分疆界标志的遗存，或者为了指示方向而修建。如今能够观察到的敖包大多位于地势相对较高之处，这也为该观点提供一定的支持。

二是认为敖包起源于墓葬。如任洪生的《蒙古族敖包习俗的文化渊源考述》，认为敖包的形制来源于“一位勇士的坟墓”，而其祭祀则起源于葬礼^①。再如包海青在《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渊源探析》中提出的观点，他说：“敖包的原型来自先祖的石板墓，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敖包祭祀源于祖先祭祀，是古老的萨满教万物有灵论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②以石为墓是蒙古族早期的习俗之一，据文献记载，以前吐蕃、突厥等民族也有用石块垒墓的习俗，如《文献通考·四夷考》中说：“吐蕃在吐谷浑西南……其墓正方，累石为之，状若平头屋。”可见早期在很多民族中，石块可能被赋予某种神圣性而用于墓葬。

三是认为敖包起源于远古的灵石崇拜信仰或对于高地的信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把敖包的起源时间推得较早。如刘文锁和王磊的《敖包祭祀的起源》，他们认为敖包在打上佛教烙印之前，还有一个更加古老的渊源，即“在萨满教信仰中的灵石，可以用来解释敖包信仰的起源”^③。这种认为敖包信仰源于萨满信仰的观点较为普遍，尤其是在研究蒙古族宗教信仰的学者中，大

多都认为敖包信仰早于喇嘛教的传入，属于萨满信仰体系。

此外，马昌仪在《敖包与玛尼堆之象征比较研究》中提出，蒙古先民赋予高地、山峦以生命和神性，把它们视为地母的化身，因而他们把沙土和石头堆起的石堆也看作神圣的守护神加以崇祀。他还假设也可能是先民在狩猎或游牧的时候，用石头设立一些醒目的标志，以便那些迷路的人能够顺利地到达营地，于是这些为了一定目的而设立的石堆，就成了最初的敖包^④。蒙古国学者苏鲁格也认为敖包崇拜源于地母女神的崇拜，并且认为敖包的选址是由萨满选择的^⑤。

上述诸观点都有可取之处，无论在文献梳理上，还是考古材料的利用上都很见功力。抛开细节不谈，上述观点大概可以归纳为：敖包文化究竟是起源于世俗，还是起源于宗教信仰？认为敖包起源于宗教的学者基本都认可敖包信仰与萨满教有关，其起源早于喇嘛教的传播。有些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看法，例如，如今可以观察到的敖包祭祀虽然有的由喇嘛主持，但多数敖包祭祀的供品却以牛羊肉为主，然而按照佛教教义，祭祀中本不应有杀牲祭祀，这可以印证学者们的观点，即喇嘛教的传入晚于敖包信仰的产生。可推断喇嘛教传入后，萨满教受到冲击，因此有的敖包祭祀仪式改由喇嘛主持。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因此学者们各持己见，在观点上并未达成一致。

（二）由清代文献考察敖包的功能

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清代多称敖包为“鄂博”，《清史稿》所记录的鄂博大部分都是作为疆界标志的，如《清史稿·高宗本纪》：“庚午，设唐古忒西南外番布鲁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鄂博。”不仅国内各部落间游牧范围以鄂博为界，中俄之间也以“鄂博”为界，如“旧设中、俄国界鄂博六：曰塔尔郭达固，曰察罕乌鲁，曰博罗托罗海，曰索克图，曰额尔底里托罗海，曰阿巴哈依图，此为库伦东中、俄界第六十三鄂博。雍正五年恰克图约鄂博止此”。此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疆理》中也提到了很多鄂博，作为蒙古各部落游牧边界，如察罕（汗）鄂博、红古尔鄂博等。

鄂博作为疆界标志，自然也就是边防要塞，这一点在《清史稿·志·兵》中有详细的描述，其曰：“沿边墩台、卡伦、鄂博、碉堡，清初于各省边境扼要处，设立墩台营房，有警则守兵举

烟为号。”这里所说的鄂博与墩台、卡伦、碉堡一样，是作为边防将士驻守之处的，遇有敌兵来袭则及时示警。之后又阐述了鄂博作为边界的由来：“蒙古各旗台、卡、鄂博之制，以大漠一望无垠，凡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或以鄂博，或以卡伦。盛京、吉林则以柳条边为界，依内兴安岭而设。”稍后又分述了台、卡伦的设立情况，其中记述在苗疆多设碉堡，新疆多设卡伦，鄂博则主要用于蒙古各旗的游牧边界，也用于中俄边界的分界。关于鄂博的描述云：“其恰克图及沿边鄂博、卡伦之制：因山河以表鄂博，无山河则表以卡伦。鄂博者，华言石堆也。其制有二：以垒为鄂博，以山河为鄂博。蒙古二十五部落，察哈尔牧厂八旗各如其境，以鄂博为防。其与俄罗斯接界，中间隙地，蒙古语曰萨布。凡萨布皆立鄂博以申画之。”

从《清史稿》等的记录来看，清朝时期，清廷将鄂博作为疆界看待，并在划分蒙古诸部游牧地区时大规模利用原有鄂博或修建新的鄂博，因此当时鄂博与蒙古族有很深的关系。如今，内蒙古草原仍有大量不同规模和形制的敖包，蒙古族保留着对敖包的祭祀习俗，几乎每个敖包都有自己的传说和祭祀日期。此外，同为北方民族的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也有祭祀敖包的传统，笔者于2009年夏季在鄂温克旗辉河地区进行鄂温克族宗教信仰与习俗的调查，期间考察了当地的一些敖包。

（三）鄂温克族敖包信仰的田野研究

鄂温克自治旗辉河苏木（鄂语“乡”）的鄂温克族于18世纪来到呼伦贝尔草原辉河流域，之后一直在该地区生息繁衍，与外界接触相对较少，因此笔者推测当地很多习俗比较古老。与蒙古族不同，该地区受喇嘛教影响较小，因此该地区的敖包信仰很可能更为接近早期草原民族的敖包信仰原貌。在考察中笔者了解到，辉苏木各嘎查（鄂语“村”）分布着众多敖包，其中有一些敖包并无明确的归属，如哈克木敖包，由附近几个嘎查共同祭祀，也有几个家族祭祀这座敖包，如何音家族等。也有的敖包是家族敖包，如西潘·杜拉尔敖包。在辉河地区的鄂温克语中，“敖包”的意思是男性生殖器，这与蒙语中的“石堆”之意有非常大的差别，是推测敖包起源不可忽视的一条线索。



图片说明：鄂温克旗辉苏木哈克木敖包。王伟摄，2009 年 8 月。

笔者推断，对敖包的崇拜很可能与早期生殖崇拜及祖先崇拜有很大关系。这一推测不仅根据鄂温克语中“敖包”的词意，还依据鄂温克人对敖包的祭祀方式等。首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鄂温克人有一种特殊的“敖包”，即萨满的陵墓，鄂温克语音译为“先当”。家族所有萨满的先当往往相距不远，这一地区被看作萨满家族的祖先墓地，每年由家族组织祭祀，这种祭祀无疑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对于先当的祭祀有严格的程序和禁忌，祭祀仪式必须由萨满主持，祭祀的目的是为了保佑家族的兴旺。鄂温克族这一习俗渊源较为古老，是萨满信仰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先当祭祀是祖先崇拜的遗存之一。



图片说明：祭祀先当，即萨满墓。手持萨满鼓、身背铜镜的黑衣者为萨满。由举行祭祀的家族成员提供，2008 年。

其次，鄂温克人传统祭祀敖包仪式女人不能参加，只能在 50 米之外等候，祭祀仪式完全由男性进行。近些年虽然随着对待女性态度的改变，大部分敖包祭祀允许女性参加，但仍有一些祭祀仪式中，尤其是先当祭祀，不允许女性接近敖包。而在鄂温克族其他仪式中，如在家中进行的祭祀萨满祖先等仪式并不排斥女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祭祀敖包与性别有关，或许蕴含

着早期生殖崇拜的某些内容。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敖包的形制，鄂温克族敖包的基本形制是由石块堆积成丘状，中间插柳枝而成。而先当的形制与此并不完全相同，先当是用石块压住萨满的尸骨，而在北方树立起柳枝，进行祭祀。敖包与先当树立的柳枝类似（参见上面两幅图片）。笔者认为，敖包很可能是对先当的模仿。之所以这样推断，因为考察北方有敖包祭祀习俗的几个民族，如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在历史上都不是定居民族，而是或游牧、或游猎，不断迁徙。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点后，很可能会树立敖包以祭祀祖先神灵，祈求福佑，后来不断演化为现在的敖包信仰。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况且现在很难解释为什么以石块压住萨满尸骨，而在北方树立柳枝，只是可以肯定它们具有某种神圣意义。为了解敖包祭祀在当代语境下的变迁，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参与了鄂温克旗和新巴尔虎左旗的两个“旗敖包”的祭祀仪式，着重对祭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仪式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调查分析。

二、两个旗敖包祭祀仪式的田野调查

在呼伦贝尔市南部的鄂温克自治旗，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敖包”的巴彦胡硕敖包。这个敖包历史较长，规模也很大，是属于当地旗政府管理的“旗敖包”。与鄂温克旗相邻的新巴尔虎左旗（当地人称东旗）的莫能宝格大山山，也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敖包，是当地的旗敖包。如今，敖包祭祀已被列为国家第一批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政府非常尊重民间传统的保存与延续，民间传统的公开性和公共性逐渐提高。2009 年夏季，笔者对鄂温克旗和东旗两个旗敖包的祭祀仪式进行了田野调查^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敖包官祭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如何完成意义演变和价值重构^⑦。

（一）巴彦胡硕敖包祭祀仪式

“巴彦呼硕”是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山岗。巴彦胡硕敖包位于海拉尔至伊敏公路的 39 公里处，巴彦胡硕敖包山的山顶。笔者所见巴彦胡硕敖包前的石刻介绍说，巴彦呼硕敖包历史悠久，是呼伦贝尔草原上最古老的敖包，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当时清政府为了巩固其在塞北边

疆的统治，派遣由鄂温克、巴尔虎、达斡尔、鄂伦春族组成的索伦兵丁三千余人驻防呼伦贝尔，其中鄂温克族兵丁及其眷属在巴彦呼硕山修建敖包，开展祭祀活动。

巴彦胡硕敖包是鄂温克旗最大的官祭敖包，人们相信对敖包的祭拜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草原风调雨顺、人畜两旺。自这座敖包建立以来，大的祭祀活动一般由喇嘛择吉日，官方主持举行。祭敖包过程分三部分：清早先请喇嘛集体诵经；诵经完毕，人们在敖包达的引领下顺时针方向绕行敖包三圈。绕行中，人们在敖包上放石头或祭品，男性可以登上敖包，在敖包上插柳枝、在柳枝上系哈达或绸条。按照传统，女性是不能登上敖包的。绕行之后，人们背北朝南，虔诚跪拜，祈求敖包的神灵赐福。人们日常途经敖包时也常常下车或下马，以一些简单的祭品祭拜敖包。也有很多牧民按照传统，在每年农历5月13日，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赶到敖包山，进行祭祀。

如今，每年6月18日是鄂温克族的瑟宾节，这一天清晨，旗政府首先组织祭祀巴彦胡硕敖包。2009年6月18日（农历5月26日），笔者于清晨4点半赶到巴彦胡硕敖包前，对这一祭祀仪式进行考察。天空下着小雨，已经有零零星星的人开车前来祭祀敖包。这时由旗政府组织的祭祀仪式还没有开始，前来祭祀的人们一般只是在长辈带领下，携带祭品前来祭拜，许下愿望，然后按顺时针方向围着敖包绕行三圈。

由鄂温克旗政府组织的祭祀仪式开始前，数位喇嘛先坐在敖包前，而前来祭祀的百姓则在山脚下，由旗领导带领，一起向敖包走来。祭祀者中也不乏一些新闻媒体、研究者、摄影爱好者等各种身份的人员。祭祀敖包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则，据笔者观察及访谈中的了解，祭祀过程大致如下：

1. 敖包达宣布祭祀仪式开始。敖包达由一位通晓鄂温克族风俗的长者担任，一般是大家推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民，有时是某大家族的族长。在笔者调查的这次仪式中，敖包达宣布祭祀仪式开始时，首先说明这是一次宗教祭祀，而非封建迷信。

2. 供祭品。祭品非常丰盛，有煮好的手把肉，羊头的摆放非常美观，各种面食、糖果、奶制品和酒等。

3. 喇嘛颂吉祥经。笔者数了一下，与一般记载请9位喇嘛不同，这次共有10位喇嘛参加了仪式，其中两个看起来是孩子。

4. 集体围敖包转三圈祭拜。在敖包达的带领下，参加祭祀的官员走在前面，其他人走在后面，围着敖包以顺时针方向转三圈。这一过程中，敖包达边走边颂祝辞，敖包达每颂一段祝辞，其他人高呼“胡列、胡列”。在祝辞的最后敖包达祝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并将祝福送给胡锦涛主席。敖包达致祝辞时使用鄂温克语，在最后祝福国家时才用汉语。

5. 跪拜敖包。前来祭祀的人，无论官民，一起向敖包跪拜叩头。

6. 求拜敖包。再次请喇嘛念经，喇嘛念经时参加祭祀的人大部分坐在喇嘛对面的红毯上，其余人站在四周。在喇嘛念经过程中，祭祀者不时拿着祭品随着喇嘛的指示，高举起来并划三圈。笔者了解到，这次喇嘛念经的主要目的是祈雨，因为2009年春鄂温克旗草原出现罕见的旱情，因此这一年的祭祀主要是求雨。

上述仪式结束后，祭祀敖包完毕，人们返回那达慕会场，举行大会开幕式，然后进行赛马、摔跤等各项比赛，晚上还有歌舞等演出，庆祝瑟宾节。

（二）莫能宝格大山敖包祭祀仪式

莫能宝格大山敖包位于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西北，甘珠尔庙附近，“宝格大”是蒙语神山的意思。巴尔虎人数百年来游牧为生，1734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四旗。1932年，新巴尔虎左翼四旗合并为一旗。2003年，甘珠尔庙重修时，在阿尔山庙主持席勒图喇嘛伦登扎木苏指点下，在莫能宝格大山修建旗敖包，定于每年农历6月18日是该敖包的祭祀日。

2009年8月19日（农历6月29日）阿木古郎镇举办吉祥草原人民那达慕大会，清晨祭祀了这座旗敖包。笔者于当日清晨4点半左右赶到敖包附近，此时这里已是人头攒动，人们冒雨在敖包前虔诚祭拜祈福。祭祀仪式与巴彦胡硕敖包祭祀类似，可能与当日甘珠尔庙开光有关，到这里祭祀的人比巴彦胡硕敖包祭祀的要多一些。

6点左右由阿木古郎镇组织的祭祀仪式开始。祭祀程序如下：

1. 喇嘛诵经。据笔者观察,此次共有16位喇嘛参加诵经,包括黄衣喇嘛和红衣喇嘛,其中以黄衣为贵。其中有两位喇嘛年纪较小,看上去还不太会背诵经文。喇嘛坐在前面,前排10人,后排6人,两个小喇嘛在后排,还有两个站着的喇嘛。诵经过程中,一位喇嘛不停向天空撒米。诵了一段时间,他们停了一会,接着又继续诵经。左侧一位喇嘛不停敲击插着孔雀羽毛的净水壶,他旁边的4位喇嘛同时击铃,右侧的喇嘛击鼓,每击10次左右便停顿一会。这样进行一段时间后,又有一位喇嘛参与进来,坐在第二排。喇嘛们坐在前两排,其他信徒有的坐在喇嘛后面,有的站在周围。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诵经后,敖包达宣布开始祭敖包。

3. 敖包达致祝辞,祝辞用蒙语。

4. 旗长带领五个苏木、镇的苏木达、镇长进行达拉拉嘎仪式。“达拉拉嘎”,是蒙语“招唤”的意思,词根“达拉拉”,本意是招手,这个仪式是表达招福和招财之意。“招唤”作为蒙古萨满教祈求礼仪的具体方式之一,一般都伴有“呼瑞、呼瑞”的呼唤,所以又称“呼瑞达拉拉嘎”。这个仪式过程即祭祀者从左到右绕敖包三圈,敖包达念祝词,每念一段祝词,大家一起呼唤“呼瑞、呼瑞”。

5. 分供品。敖包供品被看做是“敖包的福祿”,供品主要分给旗四大班子主要领导。绕敖包走完,喇嘛继续念经,部分领导就坐,其余离开。

6. 前任敖包达向现任敖包达献哈达。

7. 敖包祭祀结束,现任敖包达向下轮承办单位转交旗帜,并向“苏勒德”敬献哈达。苏勒德是蒙古族的圣物,据说成吉思汗战争时期,每一场战役都由最英武的勇士举着苏勒德走在队伍前面。这一崇拜由来已久,据《蒙古秘史》记载,早在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已有旗纛“苏勒德(苏勒定)”崇拜。在蒙古族萨满信仰中,“苏勒德”被视为九十九天神中的重要神灵,还被看作蒙古人的旗徽,守护蒙古人民^⑧。

祭祀仪式结束后,人们返回那达慕大会会场,举行大会的开幕式,开始为期三天的赛马、摔跤等比赛。

三、祭祀仪式的秩序与象征

在上述的两个旗敖包祭祀活动中,笔者与祭祀者进行了访谈^⑨。在访谈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来参加祭祀的人们,从信仰角度看,有信仰者,也有非信仰者,还有一部分人对未知世界“将信将疑”。从祭祀目的看,信仰者来祭祀出于对神灵的敬畏,求雨、求财、求运的都有,非信仰者和将信将疑者的目的则比较复杂。而作为组织者的当地政府,组织祭祀活动并非只为了祭祀神灵,更是一场表演,即现代语境下,政府参与祭祀的目的,或者说祭祀活动的意义发生了改变:不是宗教活动,而是文化活动。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敖包的意义更在于它作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一种民俗活动,是对传统的保留和延续。

(一) 祭祀者的分类与仪式秩序

在上述两个旗敖包祭祀中,仪式所表达的不仅是神人之间的互动,还构筑了有形与无形两个世界,分别体现出这两个世界的秩序。前来祭祀的有组织者、参与者和喇嘛,在祭祀过程中,这三种身份分别体现出不同的意义:

1. 仪式中的民众。在两个旗的祭祀仪式中,体现出当地浓重的喇嘛教信仰,祭祀莫能宝格大山敖包过程中喇嘛的参与程度高于巴彦胡硕敖包的祭祀,当地民众对喇嘛的信仰以及对敖包的信仰更加突出。参与莫能宝格大山敖包祭祀的民众中,有很多特殊的信众,如一位拄着拐杖的牧民,非常虔诚地绕行敖包,尽管他独立行走非常困难,中间需要休息几次才完成绕行过程,但他仍坚持完成这一过程。之后他对敖包和苏勒德虔诚敬拜,祈求病愈。再如喇嘛念经时,有一位老人拿着一叠钱,在每一位喇嘛面前敬拜布施,请喇嘛为他灌顶。参与者的虔诚更加突出了敖包的神圣性,对于敖包神灵的期望有更多具体的目的,除了传统的求雨,还有求医、求财等等。

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莫能宝格大山敖包祭祀者中,有一位女士拿着一非常特别的黄色哈达,上面印有神像,她说她的哈达是在呼和浩特买的^⑩。蒙古族的传统是以蓝色哈达为贵,这种黄色的哈达体现出接受了藏传佛教的蒙古族传统信仰在现代的演变。也有人拿着五条各色哈达,问她是何用意,她说不知道,看有五种颜色

就都买了。与此类似的是巴彦胡硕敖包祭祀中，有的年轻人被问及为什么来祭祀、祭祀什么神等问题时，显得很茫然，他们往往回答对神灵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家里长辈来祭祀，自己就来了，他们说自己祭的是“敖包神”。甚至也有长者表现出对传统仪式中的规矩已经不再那么熟悉，比如有的长者忘记应该从哪个方向绕行。

在仪式中，作为参与者的民众所体现的是对传统的遵从，甚至这种遵从有时是无条件的。现代的祭祀仍在延续着敖包作为氏族凝聚的象征的传统意义：以游牧为生的时代，同一个家族往往一同迁徙，家族不仅是血缘团体，也是地理团体。如今，同一氏族的人可能不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失去传统的地理基础后，通过氏族敖包祭祀，同一宗族又团聚到一起，因此，敖包是氏族凝聚的象征。作为氏族敖包的延伸，旗敖包也体现出这样的意义：民众通过参与每年一度的旗敖包祭典，表达对旗政府的认同，以及对自己作为当地人的身份认同。

2. 仪式中的喇嘛。为了凸显祭祀的神圣性，组织祭祀的当地政府通过喇嘛营造出一个神圣的空间。喇嘛是祭祀活动中的载体，搭建由人到神的通道。喇嘛平时由政府管理，并且政府向喇嘛提供补助^①。喇嘛的在场意味着神祇的在场，也意味着民众不能直接向神祇表达意愿，而是经由喇嘛转达。

在仪式的组织过程中，喇嘛服从政府的安排；然而在仪式的进行中，喇嘛营造了一个无形的神圣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政府组织被神圣殿堂取代。喇嘛通过代表民众向神祇祈愿，而消解了政府在有形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

在仪式中，敖包达的角色比较特别，他有着亦圣亦俗的双重身份。既是有形世界中的普通牧民、德高望重的长者，又有着在无形世界中召唤神祇，向神祇祈愿的神圣身份。

3. 仪式中的政府。政府拥有对敖包祭祀的主办权，民众具有参与权，但是民众仍可以自由祭祀，政府的权力仅在于组织这两个仪式，而这两个仪式作为鄂温克族传统节日的象征以及东旗人民的盛会，在这一天拥有的权力仍具有某种意义，宣告着一种等级、一种话语权。在这个框架下，民众有很大的自由去表达对祭祀的虔诚，如可以添加石块、插柳枝、自行准备祭品等。在少

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活动中，政府通过组织这样一个仪式表达对民众信仰的态度。

据记载，清代巴彦胡硕敖包是由八旗组织官祭，当时哈拉或莫昆制度（家族制度）尚未解体，家庭对于旗官府并无直接的依附。而现代社会家族制度的解体，使旗政府成为一个凝聚当地人的象征，每年一次的政府祭祀，强调了这一点，这是政府祭祀在当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政府通过这种组织行为，宣告秩序和威望。政府的威信需要民众的认同，这种认同需要符号和仪式的运作。

在政府组织并提供了一个祭祀的契机后，民众在一个大的框架规矩下自由表达对神灵的敬畏、献祭。因此这里体现出两个层次的仪式，一个是政府表现出来的，另一个是民众表现出来的，这两个仪式在程序上是重合的，在意义上各有侧重，它们以一种整体的方式表现出来。

（二）“信仰”的弱化与“文化”的凸显

与宗教、信仰等有关的概念很难有确切的定义，高丙中把“民间信仰”作为“与制度性宗教相对的范畴，是指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持奉的信仰及其仪式表现。民间信仰是所有以中国的社会和民众为对象（或资料来源）的学科或者分支学科的基本范畴，百年来尤为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所重视”^②。金泽也强调民间信仰的复杂性，他认为，民间信仰是根植于老百姓当中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的行为表现。民间信仰在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基本定位，涉及宗教类型的结构范畴，涉及它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它与氏族一部落宗教和民族—国家宗教的关系、它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民间信仰属于原生性宗教，而不属于创生性宗教^③。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能够明显感觉到民众对“信仰”、“宗教”等词语的敏感，作为祭祀的组织者，当地政府也在着重强调这种祭祀活动“并非宗教迷信，而是当地的文化活动”。在这里，祭祀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它的神圣性被弱化，更多是为了实现它的世俗功能，即前面提过的政府组织祭祀的象征性目的。就大多数参与者而言，尽管人们在祭祀当天盛装前来，履行仪式，维护祭祀的尊严，然而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来祭祀某位神灵，甚至不知道祭祀的是何方神祇，也并不了解祭祀中很多程序的意义，只是为了祭祀而祭祀，也可以说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维护了传统，

保留了传统。一般来说,祭祀结束后,祭祀的意义便被淡忘,人们仍回到世俗的世界,仍遵守人的规则,而非神的规则。由于政府组织了对神的祭祀,因此政府能够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代言人,这种过程通过暗示来实现,由对神圣的服从,到对世俗的服从,人们在无意识中完成了这种认同的转换。

仪式及其意义通过仪式过程所构筑的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来表达,在这里,仪式的要素共同构筑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为民众提供心灵的安顿。就组织者的目的而言,也需要这样一个符号,作为当地文化的某种象征。因此,仪式并没有表达出完全独立的神圣与世俗意义的分离,无论对于组织者还是参与者来说,现代敖包祭祀都已不仅是纯粹的宗教仪式,更是文化、习俗、传统的表达。

现代的敖包祭祀在草原上广泛存在,然而如今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已发生深刻变化。敖包祭祀中表现出来的由祭祀信仰到文化传统的演变,在当代北方民族的传统重建过程中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一方面,传统通过个体记忆传承,另一方面,传统正在被集体创造。邢莉曾对蒙古族敖包祭祀中的民间组织做过深入研究,她说:“敖包祭祀在新时期的重新建构并非只是对一个族群共同记忆的回忆,也并不止于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生存在干旱或半干旱草原的蒙古族牧民,更多地体验到一种更有效、更易于操作的乡规民约的重要功能。虽然有国家的‘大传统’在场,虽然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但民间组织的乡规民约仍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设立体现了对民间传统的尊重和国家政策的宽容。就地方政府而言,通过对敖包祭祀的仪式保留,支持了传统的延续,而又往往通过附加的话语、程序,完成了对传统的重新塑造。这种祭祀仪式既是对传统的回应,又是对传统的传承、创建。

(责任编辑:首之)

①参见任洪生:《蒙古族敖包习俗的文化渊源考述》,《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

②包海青:《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渊源探析》,《民

族文化研究》第20卷第1期,2009年1月。

③刘文锁、王磊:《敖包祭祀的起源》,《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④参见马昌仪:《敖包与玛尼堆之象征比较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3期。

⑤参见苏鲁格:《蒙古族宗教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⑥笔者于2009年6月18日独自对巴彦胡硕敖包祭祀仪式进行调查;后于8月19日与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8级民族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郭晶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2008级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乌云娜一起对东旗莫能宝格大山敖包祭祀仪式进行了调查。

⑦清代蒙古族敖包祭祀分大祭、小祭和部落或官祭,在《绥远通志稿》上,曾记载土默特旗有官祭敖包之俗:“官鄂博多在本旗边境与他旗分界之山巅或原隰诸处,昔为本旗之最大祀典。”此外,清代的索伦部,即包括今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族,也举行敖包祭祀,以旗为单位的祭祀称为官祭,由官方主办祭祀,一般每年祭祀一次,在农历五月进行,其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兴旺发达。

⑧宝贵贞:《近现代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演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苏鲁格:《蒙古族宗教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⑨由于在当地,大部分人把宗教信仰看作迷信,因此很多人对宗教信仰的话题比较敏感,所以笔者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祭祀者进行调查,以看似随意的方式与其接触,以使了解到的情况尽可能真实。由于来祭祀的人数众多,因此访谈只覆盖了其中极少部分人。

⑩现场售卖的哈达有五色:蓝、黄、白、红、绿。这五色哈达是呼伦贝尔一带很多少数民族的共同信仰,其中蓝色代表天神,黄色代表地神,白色象征纯洁,红色代表火神,绿色为植物神。其中蓝色和白色在具体的使用中较多。有时也用粉色代替红色。

⑪鄂温克旗尤其以锡尼河镇喇嘛最多,这里主要聚居着布里亚特蒙古族,他们的主要信仰是喇嘛教。锡尼河镇建有锡尼河庙,经常举办法事。大型的法事,旗政府工作人员往往以个人身份参加。

⑫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⑬参见金泽:《民间信仰的聚散现象初探》,《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⑭邢莉:《当代敖包祭祀的民间组织与传统的建构——以东乌珠穆沁旗白音敖包祭祀为个案》,《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